

文章编号: 1672-8742(2006) 01- 0001- 03

构建和谐社会与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

——兼论中国呼唤更多的陈嘉庚式的教育慈善家

殷小平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尽管中国不乏陈嘉庚先生这样杰出的教育慈善家, 但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教育慈善事业整体发展显得乏善可陈。在当前中国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并具备了大力发展教育慈善事业的条件下, 我们要汲取陈嘉庚先生致力于教育慈善事业的精神力量, 让陈嘉庚式的教育慈善家不断涌现。

关键词: 陈嘉庚; 和谐社会; 教育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

——China Needs More Educational Philanthropists like Tan Kah-kee

Yin Xiaop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such an outstanding educational philanthropist as Tan Kah-kee. However, in comparison with western advanced countries like U. S., China is much insuffici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 even if at present China h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ength to develop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 China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an Kah-kee and make effort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

Key words: Tan Kah-kee; harmonious society;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

1 陈嘉庚: 中国教育慈善家的杰出代表

陈嘉庚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和近现代华侨史上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各方面于一身的伟大人物, 是一位名闻中外的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毛泽东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对人类、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对社会影响最深和最受称道的是他一生热心教育、倾资办

学的慈善之举和高尚情操。

他把投身教育事业作为生平志趣, “自廿岁时, 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 颇具热心, 出乎生性之自然, 绝非被动勉强者”。从 1894 年在故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开始, 他先后在国内和侨居地坚贞不渝地兴办教育长达 67 年之久, 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百所以上。在“教育乃兴国之本, 兴学乃国民天职”的思想指导下, 他许下“立志

作者简介: 殷小平(1977-), 男, 汉族, 湖北黄冈人, 博士研究生, 第四军医大学训练部教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难，未尝一日忘怀”之誓言，以“有财宜输教育为义务”；一生中捐献的教育经费按照黄金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来计算，大约相当于1亿美元。¹他以自己的行动，真正实现了他所说的：“从社会拿到的钱，用之于社会，用之于国家民族”^④的崇高理想，成为华侨史上第一个“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黄炎培语）办学的楷模。嘉庚先生作为一个实业家、商人，不仅没有把教育当作商业的一部分，而且还倾其实业的所有盈利用来捐资办学，并不以倾资兴学而沽名钓誉，也反对别人为自己歌功颂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陷入必须停付集美、厦大两校教育保障经费以使公司度过难关的艰难境地时，嘉庚先生做出了“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的选择，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举债或牺牲自己的企业来维持办学经费。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的历史之长、学校之全、规模之大、育人之多、毅力之坚、影响之广，“在全部华人教育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为我国近代教育慈善事业发展史树立了一座丰碑。

陈嘉庚兴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首举，使得华侨在家乡兴办学校蔚成新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胞、海外侨胞和华裔人士通过探亲、观光、考察、寻根谒祖，对祖籍故乡有了更多的了解，纷纷以捐赠的方式兴办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汕头大学、嘉应大学、宁波大学、仰恩大学以及许许多多的中小学。然而，反观国内，近年经千呼万唤，扶贫助学的活动虽然渐渐地有了些声势，但却仍然少见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也像海外侨胞和港澳台胞那样关注教育事业，中国富豪教育慈善家严重缺位。由此可见，陈嘉庚在国内兴学的伟绩与精神，在海外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在国内的影响。有感于这种形势，陈嘉庚的孙子陈君宝先生参加集美学校90年校庆活动过后发出了一个疑问：政府花了那么多钱来纪念陈嘉庚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认为，起码应该增加一个内容，那就是要用陈嘉庚一生为国兴学的精神，来动员有钱人拿钱出来办更多的学校，设立更多的奖学金助学金。然而，人们，特别是有钱人，认为陈嘉庚和自己没有关系。陈君宝不愧为陈嘉庚后人，他说出了我们在学习、研究和宣称陈嘉庚方面的不足，在弘扬陈嘉庚精神上没有找准其实质和切入点，以致未能涌现出更多的陈嘉庚式的教育慈善家。

2 和谐中国呼唤陈嘉庚式的教育慈善家

这种呼唤不仅是出于感情上的需要，也是出

于对现实的理性思考。教育需要“两条腿”走路。纵观我国教育发展，长期以来是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粗的一条腿指的是政府所承担的教育投入。因为国家财力有限，教育又是长线工程，不能立见绩效，这粗的一腿也粗不起来；细的一条腿指的是民间的教育投资或捐资。目前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到4%，人均教育经费与世界的平均数相比较也是非常低的。穷国办大教育，光靠国家来支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靠民间资金来支持，让慈善捐赠成为弥合社会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的一剂良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怎样，在对待“物”一事上，中国文化始终没有缔成一种真正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相和谐的资产观。一方面，这和封建体制下财产安全性及个人独立支配财富的能力有关，同时又和积极实用与务虚的传统文化习性——缺乏超功利的信仰支持有关。

这是中国的情况，那国外的情况如何呢？陈嘉庚先生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就多次讲到美国教育之所以发达，一是因为政府重视，二是因为民间积极参与。他说：“诸文明国教育，除却政府注意维持外，而个人社会捐资倡设者，其数尤矩，且多有倾家捐助办学者，故其教育界能收美满之效果，非全倚靠政府也。”^⑤“美国三百所大学，其由商家兴办竟占二百八九十所，故其教育能收美满之效果。”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提供自愿捐助主要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正如摩伊所言：“宗教是慈善之母。”慈善捐赠成为人们的自愿行为，继而成为大力提倡的社会文化传统。随着第一批移民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新大陆，他们将慈善捐赠的传统也带到了新的社会环境。美国早期殖民地时期几乎所有的学院都主要依靠私人的自愿捐赠获得学校所需资源。例如，1638年9月14日，约翰·哈佛（John Harvard）因肺病去世，殖民地第一所学院获得了其遗产的395英镑和大约300卷图书。一直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教育仍然是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政府重视投入，另一方面民间办学和助学十分普遍，一些名牌大学就是依靠民间资金创办和发展起来的。以美国为例，慈善家们对于公共事业的资助首先就集中在教育，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是由慈善家们捐资兴建的。20世纪初，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众多教育慈善事业基金会，著名的有1911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和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到20世纪30年代，它们“成为大学科研的一个整体的资助基地”。^⑥卡耐基基金会在建立初期捐赠给教育的经费是五百六

十万美元,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是五百万美元,它一家就超过了美国联邦政府一年的教育经费。1919~1921年间,洛克菲勒向普通教育董事会提供了4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医学教育,这笔资金大大提高了美国医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许多医学院校位居世界著名医学院校之列。⁵

再如,2002年5月8日,洛杉矶当地一位富翁Mr. David Geffen一次向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捐赠了2亿美元。无数慈善家的慷慨资助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影响。直到现在,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而目前中国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GDP的1%。⁶耐人寻味的是,仔细审视你会惊讶地发现:在美国,慈善责任并非像资本那样被少数人所“垄断”。不错,富人的物质实力足以使之在慈善投入上做出表率,在排名榜上一马当先,但你若以为义举乃富人专利,那就错了,平民并非仅仅充当慈善的受众,实际上,他们更是慈善活动的主体和基础力量。以1996年为例,美国就有近70%的家庭参与了慈善捐款,而每个家庭用于慈善事业的平均支出为696美元。同年,全美各类慈善捐款1507亿美元。这种全民性的公益活动在社会运行和弥补政府职能不足方面——对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宪政功能,皆发挥着巨大功效。这些数字和事例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便像美国这样高度资本化和私有化的社会,慈善实已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它是自觉和非宣传、非“个案”式的,同时也是“无悬念操作”——其主体角色和事情性质皆为“普通人”和“家常事”,并非某些人想象的什么“壮举”和“感人事迹”之类。应该说,这些慈善之举虽然发生在市场背景下,但其实质却并非市场产物和变相的商业行为,更大程度上,却是一种深远的精神传统和现代生存理念合力的结果。其行为属性和质地,更多地源于一种文化习性、道义立场和生命精神,与美国人将财富和好运归功于上帝继而应当通过支持一些善事而有责任回报社会的观念息息相关。相比之下,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这一点上并未体现出其制度的优越性,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造成差距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但最基本的原因莫过于我国国民捐资兴学的传统阙如、意识淡薄以及私有财产的合法

度和安全性不够等方面。也难怪陈嘉庚先生早年感喟道:“我国民则不然,虽略知竞争于财利,若义务则茫然不知,或有知者则吝吝资财不肯倡办,袖手旁观,相互推诿,以致教育不兴,百业不振,奄奄垂死,迄于今日,言念及此,诚堪痛苦流涕。”

3 中国具备涌现大量教育慈善家的条件

当今中国教育慈善事业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本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已经具备,即政府已明确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中亦很自然地包含慈善事业,因此政府和企业等主体应联合起来大力推动并做好中国的第三次分配。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就提到过: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二是经济条件尤其具备,中国已经有10%以上的人口进入了富裕阶层,70%以上的人口进入了小康阶层,国民手中的金融资产高达10多亿元以上,从而表明具备大力发展教育慈善事业的经济基础。三是社会条件已经具备,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庞大的需求方,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对传统道德的弘扬亦有利于重新造就慈爱的社会氛围。四是教育慈善事业已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基础。除了陈嘉庚先生外,香港的李嘉诚、曾宪梓、霍英东、邵逸夫等都是代表。^⑧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在国势危如累卵的时代,陈嘉庚仍然积极倡导并致力于教育慈善事业;在无亡国之虞、和平崛起的新时代,倡导教育慈善事业更不容忽视。在积极构建和谐、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今天,我们应当万般珍视并努力汲取陈嘉庚先生热心教育、倾资办学的精神资源,大力提倡并动员国内外有财力的公司及个人和政府一起,在教育上多一些投入;政府应主动采取措施以实现高校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其中,通过减免税收等经济手段鼓励公司企业和个人向大学捐赠,努力为大学获得社会捐赠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例如,英国政府在1999年通过调节税收,允许赞助人在取得股票和证券收益的同时,削减他们自己的税收帐单,这样做能使精英大学的基金发生革命性变化,这更容易使企业家做出慈善行为;^⑨政府还可以通过将“获得捐赠能力”纳入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办法,充分调动捐款者和受益者双方的内在积极性,推动高校捐赠活动健康发展。^⑩在获得教育捐赠后,应当提倡多一点公益心,少一点营利性;多一点扶贫助学,少一点贵族化服务;多一点用在“人”身上, (下转第31页)

育质量保障的组成机构能各司其职, 高效运作。二是设置对质量评估运作的外部监督机构, 使外部质量保障行为更为透明,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及其评估结果的权威性。三是加强质量评估保障队伍的建设。针对我国的现状, 首先应进行专家遴选, 将不仅在学术上有较高造诣, 懂得高等教育评价理论、方法和技术, 而且具有较丰富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较强的判断能力及正直品质的人员, 建立起专家库; 其次是对现有机构进行人员引进或培训, 改善评价机构的人员结构; 再次是对专家队伍进行规范化管理, 使之稳中常新。

3.3 基于网络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信息化建设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应用已变得非常普遍, 这为建立基于网络的高等教育信息(包括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信息)服务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应尽快建立基于网络的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管理系统, 实时发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信息, 及时更新质量保障评价专家库, 为教育行政部门、各类高等院校和社会各界提供信息服务。另外,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质量信息的国际化交流, 我国应积极加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国际网络(INQA AHE)”。

3.4 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的理论研究

入世后, 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市场所受冲击逐渐显现, 现实问题不断涌现。我们认为, 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不仅应关注现状, 更应通过理论研究, 使行为更加科学合理, 有效地防患于未然。加强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的理论研究, 首先应端正认识, 从思想上重视理论研究, 使之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 二是应制定相应的

政策和经费等配套措施, 从制度上保障高等教育外部质量研究的进行; 三是制订相应的培养计划, 从人员质量上保证理论研究的质量。

注 释:

- ¹ 格雷新法则: 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两种铸币面值相同, 却由价值不同的金属铸成, 则价值低的货币, 会使价值高的货币推出流通领域。转引自: 万丹. 入世与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开放问题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3.
- ④ 雷庆.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发展趋势[J]. 现代大学教育, 2003, (2): 4~6.
- ④ 祝怀新, 潘慧萍. 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探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03, (10): 77~79.
- ¼ 李延成.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 一种高等教育管理与质量保障模式[J]. 高等教育研究, 1998, (6): 94~98.
- ½ Tsutomu Kimura, Akiyoshi Yonezawa, Fujio Ohmori.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rom Japan's Viewpoint [R]. CERl Governing Board meeting, 2003.
- ¾ 国内首家中美合作 EMBA 通过 SACS 评估[EB/OL]. <http://www.51zsw.com/page4/22.asp?id=1573>.
- ⑧ 熊志翔, 康 宏.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2, (2): 43~45.
- (t) 韦秀勇, 朱龙艳. 对我国现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反思与构想[J]. 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 2001, (4): 41~42.

(收稿日期: 2005-07-18; 编辑: 韦翰飞)

(上接第3页) 少一点用在“物”上; 应当提倡像陈嘉庚那样, 心里筹划着祖国的未来, 眼睛盯着现实的落后与不足, 舍得花钱, 舍得费心思和力气, 在最需要普及教育的地方发展教育, 对最需要教育扶助的人群给予扶助, 形成全民重视教育, 重视人才培养的社会风气。这样一来, 陈嘉庚精神就如星星之火, 成燎原之势, 中国就会涌现出更多的教育慈善家, 在教育事业上放出更加灿烂的异彩。

注 释:

- ¹ 洪丝丝. 陈嘉庚先生办教育[J]. 人物, 1980, (4).
- ④ 未 名. 南洋华侨抗战领袖陈嘉庚先生莅延[N]. 新中华报, 1940-06-04.
- ④ 杨进发. 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Z]. 新加坡

南洋学会, 1980. 27.

- ¼ [美] 伯顿·克拉克. 王承绪译. 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266.
- ½ 张旺. 慈善捐赠与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J]. 比较教育研究, 2005, (5): 86.
- ¾ 周文斌. 企业和谐的利益观及其支持环境[N]. 光明日报, 2005-07-08.
- ⑧ 郑功成. 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 新华文摘, 2005, (16): 15.
- (t) Kelly, Jim. Tax change to boost university endowment[J]. Financial Times, Dec. 2, 1999: 6.
- ⑧ 罗公利. 社会捐赠与高教成本分担[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4): 87~93.

(收稿日期: 2005-08-08; 编辑: 伊 夫)